

Kolev, S., & Dekker, E. (2022). Carl Menger's Smithian contributions to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23.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卡尔·门格尔对德国政治经济学的斯密主义贡献

斯特凡·科列夫 (Stefan Kolev)

欧文·德克尔 (Erwin Dekker)

摘要

在本文中，我们将卡尔·门格尔的工作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德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变联系起来。我们证明，他的《原理》(*Grundsätze*, 1871) 是始于 19 世纪初的德国主观主义传统的顶峰。门格尔对这一传统的综合可以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 中对早期知识的综合相媲美。门格尔的贡献与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如威廉·罗雪尔 (Wilhelm Roscher)，门格尔将自己的书献给了他——的智识项目相一致。然而，罗雪尔也推动了一个历史的转变，这一转变与 1872 年社会政策学会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创立后，新一代德国经济学家的一项进步政策议程相结合。这些不同的罗雪尔遗产在方法论论战 (*Methodenstreit*) 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场辩论中，门格尔在他的《探究》(*Untersuchungen*, 1883) 中阐述了一种演化的和自发的制度变化理论，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遗产相一致，并与古斯塔夫·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 和其他学会经济学家所阐述的更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对比。德国政治经济学的新政策导向方向取得了成功 (这也是由于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基本社会经济转型)，并促使门格尔在 1891 年重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尤其是斯密) 的社会政策议程。在 1871 年的综合贡献、1883 年的理论创新和 1891 年的政策议程中，门格尔对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反复接近，表明他的论点最好被理解为对贝奇所说的经济学“主线” (mainline) 的辩护。

1. 引言

传统需要创始人，而奥地利学派选择了门格尔。创始神话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们为后来的贡献者提供指引、连贯性和灵感。最重要的是，它们为传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 (通常是对立的) 身份。但创始神话也具有误导性，它们将创新和贡献归功于创始人，而牺牲了这些创新和贡献的前辈。它们认为创始人和他的同时代人之间有着比原本的情况更大的独特性——在出于有意识的忽视或出于缺乏熟悉度，不考虑创始人的原始背景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本文旨在区分卡尔·门格尔和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的其他一些早期贡献者的作品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中的神话与现实。创始神话往往是在很久以后才产生的，正如政治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他的《想象出来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 中如此精彩地展示的那样 (Anderson, 1991)。

奥地利学派的部分创始神话是它反对德国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具体地说，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关于方法的著名争论 (即 *Methodenstreit*)，让革命的主观主义边际主义者门格尔与历史学派经验主义想法的归纳主义相对主义者进行了一番

较量。这种对抗有助于加强奥地利学派的内部身份，并突出新学派的进一步鲜明特征。但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当然不应该把它们误认为是历史真相。因此，我们将把门格尔置于他那个时代的德语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中。这样做的缺点是忽略了该领域缓慢推进的国际化，但优点是拒绝了另一个创始神话，即边际革命（Black et al., 1973; Jaffé, 1976; Hollander, 1982）。

通过将门格尔置于背景之中，我们突出了门格尔对德国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核心贡献：他的《原理》（1871）的综合贡献、他的《探究》（1883）的理论创新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政策议程（1891）。我们在这里建议，这些贡献在他那个时代的德语政治经济学和亚当·斯密之间创造了连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格尔显然是反革命的（anti-revolutionary），特别是相比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其他有意识地试图与以前的东西决裂的同时代路径，尤其是历史学派。

这些对经济理论和政治实践中革命的警告使门格尔成为一个只是从字面意义上说的“边际革命者”：一个承认理论和政策上的各位巨人——他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的改革者，尽管他努力争取进步。他拒绝了他自己时代的独特性——尽管与早期的历史背景存在各种差异。我们描述门格尔的特征并将他至于背景之中，这使他成为了彼得·贝奇“主线经济学”主题（Boettke, 2012）的一个很好的代表。

2. 作为个人主义传统的德国主观主义

2.1 主观主义与边际主义

主观主义经常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重要的定义特征（Horwitz 1994）。它确实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区分开来，而主观主义是门格尔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也不能否认，正如 Jaffé (1976) 所强调的，门格尔是三个边际主义者中最主观的一个。然而，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Menger, 1871）在其主观主义上根本不是原创的。在维也纳和德国，人们广泛享有主观价值论，以及一种关于是什么将人工制品变成了财货的主观概念，正如大卫·哈珀（David Harper）和托尼·恩德雷斯（Tony Endres）在他们对本期特刊的贡献中详细展示的那样。¹

主观主义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是卡尔·海因里希·劳（Karl Heinrich Rau, 1792–1870），他的教科书在1826年至1869年间共有八个版本（Streissler & Milford, 1993, 45）。他的教科书名为《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Rau, 1826），与门格尔为他的第一部专著所选的名称相同。劳绝不是唯一一个从主观主义基础开始的人。1832年，弗里德里希·冯·赫尔曼（Friedrich von Hermann, 1795–1868）坚持认为，经济学应该从主观主义的角度出发：“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他称之为财货”（Hermann, 1832, 1, 引自 Streissler, 1990, 49）。赫尔曼后来在他的教科书中写道：“事实上，在所有情况下，决定价格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需求，其主要根源是使用价值和购买者的支付能力。从需求和需求者愿意为某件财货支付的价格，我们可以看出

¹ 关于与德国传统共同发展的法国和意大利的主观价值论传统，参见 Kauder (1953a, b)。

他们愿意为想要的财货放弃多少财货，这决定了最低报酬生产的成本有多高”（Hermann, 1832, 95, 引自 Streissler, 1990, 41）。后面的引述很好地说明了这种主观主义并没有与后来对市场价格或机会成本概念的洞察相分离。我们的目标不是否认门格尔或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在这些领域的任何独创性，而是展示他们的工作详细阐述了他们的德国前辈已经存在的主题和理论联系。在维也纳，情况也不例外。门格尔的前任阿尔伯特·舍夫勒（Albert Schäffle, 1831–1903）是主观主义方法的著名支持者，正如德克尔在其他地方所证明的那样（Dekker, 2016, 48–51）。

德国传统中主观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主观主义，也有边际主义。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 1812–1878）被有争议地称为老德国历史学派（Older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的三大主要代表之一（Pearson 1999; Caldwell 2001; Lindenfeld 2002），他在 1848 年写道：“只要需要没有改变，有用商品的数量增加得越多，每件商品的效用就会减少得越多”（Hildebrand, 1848, 318, 引自 Streissler, 1990, 44）。这同样适用于所谓的“边际革命”的其他核心原则，如边际价值产品和需求效用的等边际原理。虽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 1810–1858）的两条定律确实被忽视了，并且只是在“边际革命”（Hayek, 1927）之后才被发现，但许多关于效用的边际主义方法的表述仍在流传，尤其是弗莱堡的汉斯·冯·曼戈尔特（Hans von Mangoldt, 1824–1868）和蒂宾根的卡尔·舒兹（Carl Schüz, 1811–1875）。对门格尔的背景特别重要的是他的布拉格老师彼得·米施勒（Peter Mischler, 1821–1864），他 1857 年的教科书《国民经济学手册》（*Handbuch der National-Ökonomie*）包含了类似的边际主义表述（Streissler, 1990, 42–46）。

德国传统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路径——在门格尔的有生之年，他的学生约翰·冯·科莫津斯基（Johann von Komorzynski）将其称为“老德国使用价值或效用价值学派”（Komorzynski, 1889, 65, 引自 Priddat, 1998, 1509），其起源已被多位作者追溯到戈特利布·胡费兰（Gottlieb Hufeland）和他的《国家经济政策艺术的新基础》（*Neue Grundlegung der Staatswirthschaftskunst*, Hufeland, 1815）。胡费兰的论著比李嘉图的《原理》早两年出现，同时也处于德国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作品中的国家经济政策艺术让人想起了较早的德国官房主义，后者将经济视为政治秩序的子秩序，而将经济学视为管治艺术的子学科。基思·特赖布（Keith Tribe）认为胡费兰的理论是向新的政治学（*Staatwissenschaften*）过渡的关键一步：在这些“国家科学”中，法律、政治和经济学很快就会以相互关联的方式并存，但具有有自己独特原理的自治子学科（Tribe, 1995, 24–31）。

胡费兰的写作是在德国浪漫主义（German Romanticism）盛行的时期，这也影响了新的政治学与历史领域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在下面回到这一点。例如，马克斯·阿尔特（Max Alter）得出结论，门格尔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继承人（Alter, 1990, 36–54, 79–112）。唯心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唯心主义否定和反对唯物主义立场是德国经济学家们普遍怀疑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客观价值论的一种解释。我们将这种浪漫的主观主义称为“个人主义唯心主义”（individualist idealism），既是因为关于个性至上的哲学概念，也是作为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的理论来源。主观主义——作为个人主义唯心主

义——是一种个人价值观、个人评价和个人价值判断塑造社会发展的世界观，而不是像黑格尔的世界精神（*Weltgeist*）这样的集体主义实体。²由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和后来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发展的训练（*Bildung*）是门格尔环境的基础（*Coen, 2007*）。³正如我们在论文中概述的那样，从 1871 年的第一部专著到 1909 年的最后一本出版物，其作为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一直是门格尔的主线。。

门格尔的《原理》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本教科书，这符合当时任教资格（*Habilitation*）的惯例。任教资格论文（第二篇博士论文）面向更多的读者（通常是学生），并因此代表了一种广泛掌握该领域的证明。⁴作为教科书作者，门格尔没有提供一种革命性的背离：相反，他坚持当时标准德国教科书的结构和内容，尽管他省略了对国民财富——他在第二版中明确批评了这个概念（*Menger, 1923*）——的讨论。在劳、赫尔曼、米施勒和威廉·罗雪尔出版的德国教科书传统的背景下，门格尔最新颖的实质性贡献是他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不同的市场结构，以及在第八章中分析了货币理论。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其他地方没有细微的概念差异和批评，但他的书是按照德国教科书的传统编写的，因为这一传统在该世纪中叶蓬勃发展。它以系统的方式综合了一些有时保持孤立或不相关的理论贡献。除了这一项实质性贡献外，本书还包含一项结构创新，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将其置于与亚当·斯密相关的背景下。

2.2 罗雪尔有争议的遗产

如果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角度来看，人们会观察到与奥地利学派创始神话所暗示的相反的东西。在维也纳，门格尔出版了他遵循习俗的《原理》，该书是献给威廉·罗雪尔的，旨在系统化至少从 19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存在的理论框架。他的书展现的是对已有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收到的评价也是如此（有关评论的系统收集，请参见 *Salazar, 2021*）。

与此同时，在德国，一些事情正在酝酿之中。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任教资格论文写关于历史应用的主题变得更加普遍。例如，有人研究了莱茵兰银行合作社制度的发展（*Held, 1869*）、普鲁士税收的最新发展（*Nasse, 1861*）或行会和工会的历史（*Brentano, 1871–72*）。1872 年，社会政策学会⁵成立，它由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领导，但得到了德国经济学界的广泛支持。从那一刻起，

² 关于在历史主义的出现和演化过程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参见 *Meinecke (1936)*。

³ 这种普遍的智识发展为主观主义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解释，而不是像 *Streissler (1990)* 所建议的那样，可能与食利者的观点有关。

⁴ 任教资格论文也是这样一个时刻，在它之后，一个人会希望获得一个教职。门格尔幸运地在维也纳获得了经济学教授职位，尽管通常情况下，一个人首先会在帝国其他地方的一所排名较低的大学度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的前任阿尔伯特·舍夫勒在哈布斯堡政府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部长，之后他靠着高于教授工资的部长级工资生活，因此他的职位空缺了出来（*Streissler & Streissler, 1994*）。

⁵ 由于连续的德国正字法改革，在过去的 150 年里，学会的名称已经从“*Socialpolitik*”转为“*Sozialpolitik*”又改了回来。在本文中，我们一直在学会的名称中使用“*Socialpolitik*”，在概念本身中使用“*Sozialpolitik*”。

进入学术界的仪式变成了一项（通常是历史性质的）关于特定地区的法律或经济结构的变化应用研究。显然，这些研究并不一定与本世纪中叶教科书所阐述的理论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框架，或罗雪尔的同时代伟大综合项目相矛盾。但是这些研究的方向（*Richtung*）根本不同。它们将经济学重新拟定为一门应用科学，可以为经济现代化和下层阶级的解放提供重要知识。

罗雪尔的作品中这两种倾向都有。他在其宏伟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史中对门格尔的《原理》的评价很奇怪，因为他把它放在“历史学派”一节中，这可能是在写作过程后期添加的人为产物。但除此之外，它很好地捕捉到了门格尔的贡献：

“最后，我们说说奥地利人 C. 门格尔和他非常抽象的概念分析——这主要基于全面的经济学史（*Dogmengeschichte*）。他的工作总是独立的，而且往往富有成效；例如，它首先在孤立交换中阐述价格形成，然后在垄断贸易中，最后才包括双边竞争。”（Roscher, 1874, 1040）

门格尔将他的《原理》献给了罗雪尔，后者被广泛认为是德语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职业方面的考虑当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份献词说明了门格尔在 1871 年的自我形象，尤其是当它与序言的以下段落一起解释时：

“我们感到特别欣喜的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论述的、为一般经济学理论所涵盖的领域，有不少部分都是由于新近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发展而所创造的思想财富。所以，本书所尝试的对经济学最高原理的革新，几乎都是以德国学者辛勤笔耕所创造出的先期研究成果作为其基础的。”（Menger [1871] 1981, 49）

当时，罗雪尔在这些“新近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多方面作用。他本人并不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但他擅长将理论历史化，尤其是在确定各种学派、语言社区和传统之间的**连接和稳定发展**方面。然而，罗雪尔也被认为是最早为政治经济学设计和部署**历史方法**和地点和时间背景的重要性的人之一。

如果门格尔认为罗雪尔的工作是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典范，那么将自己视为**改革者**是完全有道理的。作为改革者，他为罗雪尔所概念化的经济知识体系的演化和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门格尔强调，他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并且其工作“几乎都是以德国学者辛勤笔耕所创造出的先期研究成果作为其基础的”，从而强化了这种自我形象。这并不意味着罗雪尔或门格尔对非德国作者采取了封闭的态度（Streissler & Milford, 1993）。在相当多的非德国思想家中，斯密在《原理》中得到的参考最多，而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经常出现在罗雪尔的经济学史以及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评价中。

除了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实质重要性之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门格尔和斯密的主要著作的目的在**结构**上的一个关键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综合性的。门格尔的《原理》和《国富论》的创新性都主要在于**将先前存在的经济理论部分结合成一个新的整体**。门格尔和斯密都被要求处理他们书中各个元素的新颖性。但他们的

主要贡献都在于理论的连贯性和相对简单性，他们以其呈现了他们的时代所积累的知识：门格尔在《原理》中浓缩了德国主观主义传统，而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经济学。1871 年，门格尔可以相信他正在继续和深化斯密和罗雪尔的综合项目。

用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来说，门格尔和斯密的贡献在于将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了一次迷人的组合，正是这两次汇总的迷人本质为下一代开辟了一条智识之路——同之一起，它们创造神话的努力使门格尔成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斯密成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其代价是在综合者将线索编织成鼓舞人心的汇总之前已经存在的东西。《原理》中对斯密的参考证明了门格尔对《国富论》的深入研究，这甚至到了模仿斯密的论证风格和结构的程度：“我知道我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厌烦。沿着亚当·斯密的道路，我将冒着一些乏味的风险来获得清晰的阐述”（Menger [1871] 1981, 133）。

之所以出现这种复杂性，是因为同时年轻一代的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阿道夫·赫尔德（Adolf Held）、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和卢霍·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也认为他们正在为经济学的发展迈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在门格尔这个年龄段的所有人中，他们都在像罗雪尔这样的老德国经济学家的支持下，在社会政策学会周围聚集力量，罗雪尔于 1872 年在艾森纳赫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施穆勒撰写的呼吁书上，他们展示了对旧经济学的一定程度上的不耐烦和不适：

“我们深信德意志帝国的未来以及我们文明的未来总体上将受到我们社会状况在不久的将来将如何形成的重大影响（……），呼吁所有政党的会议人员，假设他们对此问题有兴趣和道德伦理关注，并认为绝对的自由放任在社会问题上不是正确的事情。”（引自 Grimmer-Solem, 2003, 176）

施穆勒这一代人受到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统计工作的影响，这位经济学家现在主要以他的恩格尔曲线而闻名。19 世纪 50 年代，恩格尔担任萨克森州统计局局长，1860 年，他成为普鲁士统计局局长，并一直担任这一有影响力的职位直到 1882 年。他是德国统计领域的主要创新者，他的工作融入了我们所谓的“制度统计传统”，这种统计分析路径围绕着学会形成，继而成为了历史学派的核心。这种“制度统计”路径强调对不同制度安排如何产生不同结果的研究。这使得可以在不同时期以及处于不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阶段的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在本节开头提到的赫尔德、纳塞和布伦塔诺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该路径在当时是社会统计的前沿，后来在时间序列分析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但表现出对强泛化的不情愿，而是强调制度结构的质的差异。⁶

施穆勒在 19 世纪 60 年代发表了他关于德国工业化影响的第一份主要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区分了工业化的暂时的和永久的不利因素。他发现，工业化在

⁶ 最近对 20 世纪 20 年代制定商业周期统计国际标准的尝试的研究强调了这种制度统计路径在 20 世纪之前在欧洲大陆（包括俄罗斯）有着什么样的持续重要影响（Clavin, 2015; Lenel, 2018; Kolev, 2021）。

工作条件、工资和对手工业部门的影响方面造成的大多数危害本质上是暂时的。19 世纪 40 年代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但到 19 世纪 60 年代，工业化对工人及其生活条件产生的主要影响已经变得很明显。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代表了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着眼于短暂的痛苦。它尚未包含他将在 19 世纪 70 年代采用的激进改革议程。在 19 世纪 70 年代，学会推动了旨在改善住房条件、失业和残疾保险的计划、项目和政策。这原本应该通过自愿的互助协会（Selbsthilfe）以及通过国家来实现——社会改革者对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制度的相对重要性存在显著分歧（Grimmer-Solem, 2003, 第 7 章）。

罗雪尔的遗产在他的一生中就已经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历史方法应该有多“历史”，以及这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塑造中欧的政治经济现实（Sommer, 1932）。

2.3 自发秩序与个人主义

到 1880 年，德国政治经济学的格局，尤其是德国经济以及政府对它的政策，已经充分受到学会和新历史方法的影响，因此罗雪尔在其 1874 年著作中总结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正在褪色。门格尔的《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探究》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sbesondere*, Menger, 1883）的主要目标正是针对这一议程，这一事实很容易被一种狭隘的方法论论战框架所掩盖。门格尔和施穆勒并非没有对方法争论不休，他们肯定争论了（Horn & Kolev, 2020）。但他们的分歧源于他们对社会变革的看法。由施穆勒为首的学会提出的改革议程相信门格尔称之为“务实改革”（pragmatic reform）的东西，即旨在促进特别是工人阶级福利的制度设计。正如格里默-索利姆（Grimmer-Solem）在他对这一时期的出色研究中所证明的那样（Grimmer-Solem, 2003），其目标是将工人阶级融入中产阶级，从而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同时也是为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动思想的堡垒，一个植根于中产阶级信念和忠诚的堡垒——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学会内部，对于促进德国一体化和无产阶级解放到德国中产阶级社会所需的政策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在 1879 年法兰克福会议期间达到顶峰，施穆勒和克纳普决定支持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经济议程，其中包括铁路和烟草行业的关税和垄断（Frie, 2013）。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信这些政策本身就是合理的，而是希望俾斯麦将这些改革与大胆的社会立法结合起来。赫尔德、布伦塔诺和其他人原则上反对关税，但更担心俾斯麦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与主要工业或农业利益所结联盟的开放性（Sheehan, 1966, 第 5 章）。

这种政治背景很重要，因为它形成了从 1870 年到 1880 年情况的根本变化。尽管更具历史导向性和经验性的经济学在 1870 年左右已经兴起，但到 1880 年它也通过议会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因素。它首先将自己展示为一个广泛的经济学家平台，试图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学会被用作 1885 年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的模型（Ely, 1936）。但学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党派组织，其中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的政治紧张局势。然而，它试图充当国会大厦（Reichstag）的咨询机构——国会大厦本身缺乏进行科学研

究的行政能力，并通过单个学者或团体进行的大量实证调查来做到这一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 1890–1892 年关于农业工人状况的调查，马克斯·韦伯为这份调查贡献了德国东部省份的部分（Weber, [1892] 1984）。

当门格尔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写下他的《探究》时，他不仅仅是在回应对他的《原理》的批评性评论。事实上，这些评论的真正重要性仍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Streissler, 1990; Yagi, 1997; Salazar, 2021）。他也不只是为德语政治经济学的方向而战，尽管对主席任命的控制问题在争议中肯定很重要（Blumenthal, 2007, 67–71）。门格尔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做出了回应——在该变化中，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人们推行了更为激进的经济政策。随着这种政治转变，与学会相关的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施穆勒）成为了直言不讳的政治活动家。

紧张关系的一方是门格尔与劳、赫尔曼和罗雪尔的老德国传统以理论为导向的经济学，另一方是施穆勒、克纳普、赫尔德和布伦塔诺以实践和制度为导向的经济学，后者现在已经获得了明显的政治优势。门格尔主张采取一种谨慎的路径，这植根于较早的经济政策原则，符合经济理论的坚实基础，而学会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政策可以——也应该——积极塑造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这种分歧的核心问题成了制度的性质和起源。

格里默-索利姆在他的研究——在其他问题上都很出色——中给出了对门格尔看法的典型观点，这种看法将使学会的改革派感到自豪：

“门格尔实际上提出的不是对经济和社会结果的理性主义描述，而是对现有结果的辩护，理由是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像门格尔这样的原子论者来说，机体论（*organicism*）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将个人与社会结果联系起来，既不需要考虑群体的形成，也不需要考虑这些群体对社会结果的任意影响。门格尔的方法实际上与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融为一体，他并没有试图将他的政治目的论与他的科学方法批判性地分开。”（Grimmer-Solem, 2003, 257）

他正确的是，他找到了制度发展理论的根本区别，但格里默-索利姆使用了一个与门格尔格格不入的评价框架，并奇怪地反对门格尔，即他将他的社会愿景与他的科学相结合，而这正是历史经济学家的既定目的。

八木（Yagi, 1997）更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果的概念化方面，门格尔取得了超过其德国前辈的重大进展。当一代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包括律师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开始关注有机发展的制度时，他们求助于大众精神（*Volksgeist*）或民族等集体观念来解释它们的出现。这导致了循环解释，其中制度的差异是通过参考文化或民族差异来“解释”的。门格尔同意他们对制度的机体论概念，但——与我们在上文所说的他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相一致——试图解释它们是从个人行动和利益中产生的。他的《原理》中关于货币出现和演化的理论仍然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门格尔来说，制度是从个人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他试图将不同的

制度分解回它们在个人行动中的分析起源。施穆勒反对门格尔对制度（比如货币）的孤立处理，并认为（宏观）制度是经济生活的形成因素。政策条件和历史条件才是真正的基础，因此，经济变化和改革更有可能来自于有意识的制度变化。

这一概念及其与较早的演化机体论传统的相似之处使门格尔与施穆勒直接发生了冲突。正如八木所展示的那样，施穆勒嘲笑“门格尔以萨维尼的方式对民族精神的神秘主义的强烈同情”，但与门格尔同时代的主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与萨维尼相比，罗雪尔并没有开始有着如此神秘浪漫的想法。”（Schmoller, [1883] 2021, 引自 Yagi, 1997, 247）。门格尔则反对纯粹的“实用主义”制度观，这是他对理性主义设计的称呼。无论我们的精确评估如何（我们将在下面提供更多评估），这里正在发生真正的突破。但门格尔并没有迫使人接受或创造这种突破，他试图重建和巩固他与萨维尼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联系在一起的旧机体论制度概念。这一突破是由学会周围的经济学家创造的，他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和制度改革的法律实证主义（legal-positivistic）或理性主义-建构主义（rationalist-constructivist）理论。门格尔的作品延续了他试图复兴的旧德国历史传统。

值得强调的是，正是这种制度变化理论为哈耶克在 20 世纪中叶的贡献奠定了基础。虽然哈耶克通常依靠经济思想的程式化历史（stylized histories）来提出分析观点，但他正确地看到门格尔重新发现或重新引入了对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至关重要的制度形成理论——尽管门格尔的声明（尤其是在《探究》的第 4 篇第 2 章中）没有表明门格尔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贡献置于斯密的传统中，至少没有表明他是否像哈耶克后来在阅读与门格尔有关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所做的那样做。在 19 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历史思想中，这种机体论的或自发的制度形成理论继续具有重要性。

对门格尔的新古典主义解读容易忽视门格尔的制度主义。最近范特·克洛斯特通过暗示门格尔试图限制（纯）经济科学的范围（Klooster, 2022），对这种解读提出了一种变体。但新古典理论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制度演化理论，因为它设定了独立于制度背景的理性主体，而门格尔没有这样做。相反，门格尔很适合彼得·贝奇（Peter Boettke）所说的“主线经济学”，它的“学术努力集中在研究这些【认知受限的】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在劳动分工下创造出复杂的社会安排，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Boettke, Fink & Smith, 2012, 1220）。在这一主线传统中，交换是通过制度形成的，而货币是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因此，门格尔研究了货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并实现了更广泛的和更精细的交换形式。他在历史学派中反对的是这一想法，即可以简单地自上而下设计或实施最佳或更好的制度，这是他的学生（也是哈耶克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阐述的一个关键问题（Wieser, 1910; 1914）。

贝奇的主线解释有两个额外的好处。首先，他将这条主线与一个主流进行对比，后者在某个时间点可能太偏向理性主义方向，或者太偏向历史相对主义方向。门格尔关于理论相对于历史学派重要性的论证是后者的一个例子，而哈耶克在 20 世纪 30 年代重新发现门格尔的演化制度主义是前者的一个例子。其次，主线主题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特征是经济思想的连续性，而不是中断、一时

的风潮和所谓的革命 (Boettke, 2012)。这种连续性和渐进的改进正是斯密、罗雪尔和门格尔看待经济知识增长的方式。

3. 社会政策和政治经济学：新相识还是老表亲？

3.1 19 世纪 80 年代的分歧

争夺罗雪尔遗产声望的两个阵营在 19 世纪 80 年代方法论论战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冲突。施穆勒新兴的新历史学派 (Younger Historical School) 的演化和不断增大的影响力扩大了差距。施穆勒已取代罗雪尔成为德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领导人，并因其在学会中的突出作用而得到加强。

这种冲突不仅是方法论或政治上的，而且还涉及学术政治。围绕主席任命的争议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危机四伏的气氛：在 1885 年的弗莱堡，欧根·冯·菲利浦维奇获得任命，奥地利人赢了，而在 1887 年的维也纳，卢霍·布伦塔诺获得任命，德国人赢了 (Leipold, 2021, 114–42)。布伦塔诺是热心的自由贸易论者，在政治观点上与门格尔最接近，多次在学会内部就自由贸易问题反对施穆勒。他在维也纳的就职演讲试图调和施穆勒和门格尔之间的差异，尽管他对两人的同情并不一致。但是，门格尔并没有寻求和解，一年后布伦塔诺深感沮丧地去了莱比锡 (Sheehan, 1966, 106–108)。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应用经济学和奥地利理论家迅速分道扬镳。门格尔最重要的学生欧根·冯·庞巴维克 (Eugen von Böhm-Bawerk) 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完善了他们导师的边际理论。庞巴维克的著作《从经济角度看法律权利和关系》 (*Rechte und Verhältnisse vom Standpunkt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Böhm-Bawerk, 1881) 延续并扩展了老德国主观主义传统。与他之前的门格尔一样，庞巴维克批评外国作者们过于依赖物质或其他有限的经济财货概念，而庞巴维克试图将其扩展到权利和关系。他明确指出，对（潜在）经济财货的广义性质的认识是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强项 (Böhm-Bawerk, 1881, 26–27)。他随后关于资本理论的工作强化了奥地利人只对纯理论问题感兴趣的印象。维塞尔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自然价值》 (*Der natürliche Werth*, Wieser, 1889) 从理想化的假设开始研究鲁滨逊环境下的评价，之后逐渐放宽了理论假设。尽管维塞尔注意到一般原则的应用不是一个机械过程这一事实，但他的风格和阐述与当时的德国政治经济学越来越不同步，后者结合了统计材料并倾向于经验地研究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例如，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在其职业生涯后期被维塞尔的工作所吸引 (Kolev, 2018, 9–19)，他于 1889 年毕业，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的法律制度，并于 1892 年完成了他关于罗马帝国农业部门的法律制度的任教资格论文。

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这种氛围下，门格尔和德国经济学家之间不再有富有成效的交流——尽管在 1875–1876 和 1876–1877 学年期间，门格尔已将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派往德国，与莱比锡的罗雪尔、海德堡的克尼斯和耶拿的希尔德布兰一起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 (Tomo, 1994, 44–52; Hennings, 1997, 9–10; Kolev, 2018, 5–6)。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领先思想家之外，情况几乎不会改变。门格尔的其他能人（学生）也在德国从事与应用方向不同的研究项目。1884 年，埃米尔·萨克

斯 (Emil Sax) 发起了一项关于税收和公共财货理论的研究计划, 该计划具有边际主义的内核 (Sax, 1887)。同年, 维克多·马塔亚 (Viktor Mataja) 开始理论化企业家利润以及基于边际主义理由的责任和侵权法 (Mataja, 1884)。换言之, 他们延续了门格斯的理论导向计划, 并试图将主观主义边际主义扩展到新的方向。欧根·冯·菲利波维奇一直是, 并且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在任职期间, 他通过研究英格兰银行的作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将奥地利理论与德国对比较制度的关注结合起来 (Philippovich, 1885)。

3.2 社会问题在 19 世纪 90 年代来到维也纳

19 世纪 80 年代是一段充满争论和分歧的时期, 但 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出现了显著程度的趋同。这无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促成的——时间的推移有助于治愈大多数伤口。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趋同的程度。为此, 需要考虑维也纳和哈布斯堡帝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这种背景的重要性本身就是方法论大战的主题, 我们提请大家注意它, 意味着我们认识到历史学派所倡导的历史制度主义的价值和重要性。

施穆勒和学会的经济学家制定了一种专门针对年轻的德意志帝国背景的政治经济学: 他们评定出, 德国经济和社会在 19 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动力, 不同于社会经济变化的早期过程 (McAdam et al., 2018)。这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技术或人口变化的问题。理论上, 学会的经济学家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社会, 即它在旨在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极端, 与针对反现代逆托邦 (retrotopia) 的反动保守主义极端之间日益分裂 (Balabkins, 1988, 第四章)。在制度上, 帝国处于民主化的最前沿。帝国议会于 1871 年成立时实行男性普选, 比奥地利 (1907) 或英国 (1918) 早得多。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通过了工厂健康和安全法, 而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在俾斯麦的倡议下, 针对事故和健康保险的进一步法案出台。在普鲁士和萨克森, 社会民主党运动在 19 世纪 70 年代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参与者, 这促使俾斯麦在 1878 年取缔该党, 但在 1890 年禁令解除后, 该运动反弹得更强劲 (Perrin, 1910; Wegner, 2020)。

相比之下, 奥地利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要慢得多。主导哈布斯堡帝国的冲突是民族主义的冲突, 特别是对各个民族和地区的更多自治的要求。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仅在一代人之后才发展为在普鲁士和萨克森的运动的产物, 直到 1888 年才成立社会民主党 (Judson, 1996)。与德国相比, 社会民主党无法吸引整个帝国的支持, 并且主要局限于维也纳和波西米亚的工业中心。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热情相比, 奥地利姊妹党在其长期的、以改革为导向的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 (Victor Adler) ——他直到 1918 年仍是主导人物——的领导下保持温和 (Kogan, 1949; Cohen, 2007)。

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这些重要差异, 无论是在社会经济方面还是在主要的政治冲突方面, 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问题”在 19 世纪 80 年代对门格斯和他的学生来说并没有那么紧迫, 但是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维也纳人对边际主义理论的进一步理论改进在德国经济学家中遭到冷淡的评论或简单的冷漠。然而, 到 19 世纪 90 年代, 推动学会成立并改变德国政治经济学方向的社

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要求也在奥地利发生了。

1875 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协会（*Gesellschaft österreichischer Volkswirte*）成立，门格尔的同事洛伦兹·冯·斯坦（Lorenz von Stein）担任第一任主席（Egger, 2001, 4–9; Klausinger, 2019, 488–489）。在最初的热情之后，协会进入休眠状态，但其活动于 1888 年恢复（Wasserman, 2019, 51–54）。复活的协会广泛的新组成表明它已复活成为一项普世的努力。1892 年新当选的主席是卡尔·西奥多·冯·伊纳玛-斯特内格（Karl Theodor von Inama-Sternegg），一位曾担任维也纳中央统计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史学家；庞巴维克成为代表理论传统的董事会成员；菲利波维奇在历史或政策导向的传统与理论传统之间扮演了典型的桥梁角色。

1893 年，菲利波维奇从弗莱堡返回维也纳，同时成为社会改革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他在协会和同样成立于 1893 年的维也纳费边社之间建立了联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也加入了协会，并且是 1892 年 1 月会议上讨论新劳工立法的主要发言人之一（Egger, 2001, 13–14）。在经济学家们在协会的这些新活动之前，政治潮流发生了一项重要变化：19 世纪 80 年代是奥地利根据德国先例首次引入社会保险计划的十年（Ebert, 1975）。

1892 年，新期刊《经济、社会政策与行政期刊》（*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的创立最能体现新精神。⁷它是复兴的协会的官方刊物，它的标题反映了它对理论和更为政策导向的工作的双重兴趣。新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讨论了《奥地利的社会改革》（*Socialreform in Oesterreich*）。这可能给人一种历史经济学家赢得了胜利的印象，但在此之前，Böhm-Bawerk (1892) 发表了一篇同样重要的文章，题为《我们的任务》（*Unsere Aufgaben*）。他对摆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面前的任务进行了纲领性的概述。这项任务的核心是这一问题，即经济学家必须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他们时代的特殊需求和特征。庞巴维克主张一条中间道路，这条路清楚地认识到既存在经济学的普遍不变因素，也存在社会科学家应该寻求服务的历史特定需求。这一框架后来在施穆勒几年后担任柏林大学校长时的纲领性演讲中得到回应，题为《国家和社会科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变化的理论与固定的真理》（*Wechselnde Theorien und feststehende Wahrheiten im Gebiete der Staats- und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ie heutig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slehre*, Schmoller, [1897] 2018）。

庞巴维克首先承认当代宪法秩序以及现代经济的组织要求已发生变化这一事实。他敦促他的经济学家同行们理解当前时代迫切需要“新形式”（1892, 2）。这一具体任务是经济学不变任务的一个实例化：“让经济和技术进步的福祉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上）。当他嘲笑困扰社会科学一段时间的“风潮”是“激烈地竞争”而不是“以兄弟般的方式伸出援手”，他只是用温和的隐瞒方式表达了他对方法论论战的挫败感（1892, 5–6）。借助戏剧中的隐喻，他试图勾勒出实践者、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分工。

⁷ 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期刊的刊名与施穆勒编辑的同时期刊的刊名非常接近，后者后来更名为 *Schmollers Jahrbuch*，其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刊名为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在最后几页，庞巴维克谈到了实际政策问题。他区分了那些因为抵消了供需原则（例如更高的工资）而只是昙花一现的措施，以及诸如失业、健康和老年保险，对具有“正常”工作时间的清洁和技术安全的工作场所进行监管等可持续的措施（1892, 7-9）。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社会政策的关键是不断寻找一套制度，使个人能够应对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理论可以为正在进行的制度改革进程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

庞巴维克对新协会的大帐篷（big-tent）⁸路径的呼吁表明，在方法论论战的热潮之后仅仅十年，维也纳就有一种离开战壕寻求融合的愿望。在庞巴维克重新统一的经济学中，伦理和政治考虑具有明确的功能和地位。在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中，理论“不仅是给予者”，它也应该“从实践中获取”：

“它从小规模和大规模的实践中获得。在小范围内，它受益于源源不断的经验、观察和见解，丰富和纠正了它的知识。在大范围内，它从生活中获得它的主题，它的动人的冲动：它的问题，同时它的真正热情——没有这种热情，一个人就不能也不应该处理社会问题。在其他科学中可能会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中，内心先于头脑。我们这门科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几乎从来都不是出于冷酷的理论兴趣，对知识的渴望也不仅仅是出于对科学洞察力的渴望。这些问题通过实际需要压在我们身上。几个世纪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Böhm-Bawerk, 1892, 10）

这些不是空话。协会的第一卷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新的、重新统一的经济学将是什么样子。⁹这种政策转向不仅限于期刊。在协会讨论的中心主题中，应用主题主导了议程：银行、证券交易所、金融、社会政策、贸易和企业、农业、移民、外贸（Egger, 2001, 28-33）。

政策转向也到达了维也纳。汇合的象征性时刻是 1894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学会会议。乍一看，专门针对卡特尔和农业继承法的会议协议与前二十年的会议似乎没有什么区别（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1895）。但重要的细节显示了这次会议对应用经济学重聚的影响。菲利波维奇的开幕词强调“社会问题”已经抵达奥地利。菲利波维奇、施穆勒作为学会的负责人以及伊纳玛-斯特内格作为协会的负责人共同主持会议，这清楚地表明了两个帝国的经济协会之间新的制度和谐。同盟中的奥匈帝国成员从会议前的 10-12 人增加到会议后的 144 人，导致学会的总成员从 375 人激增至 489 人（Grimmer-Solem, 2003, 268-275）。新成员包括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以及他们同时代的菲利波维奇、萨克斯和其他门格斯的伙伴，如鲁道夫·奥斯皮茨（Rudolf Auspitz）和里夏德·利本（Richard Lieben）。

3.3 门格尔与社会问题

门格尔没有加入学会，但即使是他也无法再否认政策转向。他在《政治学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Menger, 1892）中关于货币的长文

⁸ 指包容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观点。——译者注

⁹ 所有卷都在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完全数字化：<https://anno.onb.ac.at/cgi-content/anno-plus?aid=zvs&size=45>

不仅是一次理论贡献，也是 1892 年通货改革的实际推动力（Chaloupek, 2003）。但他对社会问题最杰出的贡献是在维也纳领先的自由主义报纸《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上发表的一篇长文，它写于 1891 年，以纪念斯密逝世一百周年（Menger, [1891] 2016; Dekker & Kolev, 2016）。这篇文章是对斯密遗产的广泛反思，特别是他的社会政策议程。这篇文章试图为斯密辩护，反对最近德国经济学家的错误指控和误解，但最重要的是，门格尔试图证明斯密有一个社会政策议程：

“在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每一次利益冲突中，斯密无一例外地站在后者一边。我使用‘无一例外’一词是经过适当考虑的，因为在斯密的作品中找不到一个他在其中代表富人和强者的利益，反对穷人和弱者的例子。尽管斯密高度赞扬个人在经济事务中的自由主动性，但他是否积极推动国家干预以废除法律（或法律的执行），这些法律压迫穷人和弱者，而有利于富人和强者。”（Menger, [1891] 2016, 475）

换句话说，门格尔旨在证明社会政治不是德国最近的发明，而是自斯密以来（至少）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争议以及门格尔的学生里夏德·许勒尔（Richard Schüller）的后续论文《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敌人：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政策史》（*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ihre Gegner: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ocialpolitik seit A. Smith*, Schüller, 1895）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问题是否需要一种新型的经济学，而门格尔的回答是响亮的“不”。这篇文章还表明，门格尔绝不相信 1870 年左右的政治经济学在边际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发生了裂痕。相反，他试图将自己的智力计划定位为斯密、李嘉图、萨伊和德国主观主义者（尽管后者不再明确提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伸。这种解释与施特莱斯勒（Streissler）和施特莱斯勒所描绘的门格尔在 1876 年给王储鲁道夫·冯·哈布斯堡（Rudolf von Habsburg）的讲座非常吻合，这些讲座也是围绕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组织的（Streissler & Streissler, 1994）。这些讲座的斯密式核心强调了我们的主张，即尽管价值理论家门格尔在德国传统中工作，政治经济学家门格尔在斯密那里看到了一个关键的参考点。这不是一次后来的皈依，而是一直存在，包括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他辅导王储并带他去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探访斯密的苏格兰（Schumacher & Scheall, 2020, 175–176）。

无论门格尔为斯密辩护的方式多么正确，他的做法都因缺乏对当代社会政策问题的讨论而显得突出。¹⁰施穆勒这一代人曾批判性地认为，19 世纪后期的经济问题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此需要一种不同的、更专业和更历史敏感的路径。即使门格尔关于斯密也有社会政治议程的论点会被一致接受，这对施穆勒这一代人的信念也没什么影响，因为他们认为目前的情况需要与斯密写作的时代不同类型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十九世纪末的社会问题与十八世纪末的社会问题是不同的。

1909 年 9 月，在门格尔有生之年，维也纳和学会最后一次相交。正是在这次维也纳会议上，在较早的会上的几次小规模冲突后爆发了著名的判决争议——Werturteilsstreit（也被称为“新方法论论战”）（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1910）。

¹⁰ 这种评估不同于在介绍我们对门格尔评价斯密的翻译时，我们所提供的背景化。

这次会议促成了门格斯的最后一篇文章：就像斯密的百年纪念一样，它发表在《新自由报》上，题为《德国社会经济学的新方向》（*Neue Strömungen in der deutschen Sozialökonomie*）（Menger, 1909）。他报道了 1909 年的学会会议，但不清楚他是参加了会议，还是根据计划和朋友的叙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语气是讽刺的老学者的语气，他讽刺地祝贺学会成立 36 年来第一次专门为经济理论安排对话。在为门格尔一直为理论的包容性辩护这一事实而自鸣得意之后，人们对“回归”理论——通过“方法论问题”——的“小开始”进行了充满希望的反思。门格尔宣称，方法问题是“德国科学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这对“德国年轻经济学家的理论倾向部分”将大有裨益（Menger, 1909, 14–15）。由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发起的“新方法论论战”围绕着我们称之为“主观主义 2.0”的东西：允许将分析者的主观价值观纳入政治经济学（Derman, 2012; Glaeser, 2014）。由于支持韦伯和桑巴特对这种允许性的否认，门格尔的公共生活在大约四十年前开始的地方结束了：在主观主义价值传统中。最初他处理经济中的主观评价，现在他通过鼓励年轻一代的德国学者处理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评价来结束循环——正如门格尔在第 2 节中讨论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所包含的那样。

门格尔可以宣称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终于回到了桌面上。但对于我们将其作品至于背景之中来说，更重要的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分歧似乎已经将制度分析和理论分析分开之后，政治经济学正在回归其主线。门格尔 1891 年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政策议程的文章不仅纠正了他的同时代人对自由经济学家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看法，而且还纠正了对斯密工作的过度理论解读。它重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与门格尔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前景上。

4. 结论

我们在本文中的目标是将门格尔的贡献放进德语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之中，无论是在他的《原理》之前的时期还是之后的时期。这使我们能够证明门格尔的贡献不是革命性的，无论是在边际主义方面还是主观主义方面。然而，它们迅速与德国政治经济在 19 世纪 70 年代所采取的方向变得不同步。他的《原理》受到启发并延续了以理论为导向的教科书传统，该教科书传统在 19 世纪中叶左右主导了德国政治经济学，威廉·罗雪尔的专著就是例证。他提供了对这一传统的迷人和鼓舞人心的综合，它捕捉并激发了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群体的下一代的思想。

门格尔对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逐渐出现和演化的分析与早期的方法类似，尽管他在对制度出现的分析中加入了独特的个人主义元素。如果他的书早在十年前问世，那将正好符合德国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和时代精神。但在 1872 年由德国主要经济学家创立社会政策学会之后，该学科的方向发生了变化。随着 19 世纪 70 年代的推移，门格尔的主观主义理论方法与施穆勒和学会的其他主要经济学家发展的新型社会和改革导向经济学之间的脱节变得更加明显，在此期间，德国的工业化迅速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早期引入男性普选的基础上坚定地崛起。哈布斯堡帝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工业化充其量只是区域事务，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主导着政治。这一系列独特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助长了新兴的奥地利边际主义者与学会的

改革派经济学家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

从这个背景来看，方法论论战期间的决定性问题在本质上与方法论一样具有政治性质。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经济知识的来源上，但同样也集中在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和可取性上。更保守的自由派门格尔认为，制度改革是一个有机过程，必须逐渐自下而上地进行，而学会经济学家则试图通过积极的社会改革来阻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要求。这针对广泛的中产阶级社会，有时通过自下而上的自愿协会，并在需要时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门格尔为斯密和德国老派的制度观辩护，认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

我们论文的第二部分表明，这种分歧被证明是暂时的。当盎格鲁-撒克逊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提供了新的自信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变得越来越关注社会和经济政策问题。尽管在德国学会成立后不久，在维也纳成立了一个经济学家协会，但它已经处于休眠状态。在 19 世纪 90 年代，这个协会及其同事成为了一个讨论经济政策的平台，与德国学会提供的平台没有什么不同。庞巴维克、维塞尔、萨克斯、菲利波维奇和许多其他门格尔学生都是这一新运动的积极成员，该运动以与 20 年前在德国发生的类似方式重新定向了经济学。

门格尔对这种重新定向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没有参加协会或 1894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学会会议。在他确实参与社会政策主题的一个例子中，他加强了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政策议程——旨在消除经济自由的法律障碍——的连续性。这加强了我们的观点，即最好从 19 世纪 50 年代德国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阅读他的《原理》——而不是像奥地利学派创始神话所暗示的那样，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瑟夫·熊彼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的著作，或者，如新古典主义镜头所暗示的那样，作为边际效用理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我们的解释为贝奇所提出的连续性提供了支持，这种连续性是“主线经济学”的特征，正如我们所声称的那样，这是一条从亚当·斯密到弗农·史密斯的政治经济学分支——通过卡尔·门格尔。这有助于理解对斯密式洞见的重新引入，它将门格尔对他那个时代的辩论的贡献，以及他将其《原理》定位为对《国富论》的复合的方式，描述为对德国政治经济学和之前所提供的所有最佳之物的延续。这种解释的结果是，门格尔不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边际革命者，而是一个反革命者，他反对他那个时代的主流，即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和政策创新。

参考文献

Alter, M. (1990). *Carl Menger and the origins of Austrian economics*. Westview Press.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alabkins, N. W. (1988). *Not by theory alone... The economics of Gustav von Schmoller and its legacy to America*. Duncker & Humblot.

- Black, R. D. C., Coats, A. W., & Goodwin, C. D. W. (eds.). (1973).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lumenthal, K. (2007). *Die Steuertheorien der Austrian economics: Von Menger zu Mises*. Metropolis.
- Boettke, P. J. (2012). *Living economic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 Boettke, P. J., Fink, A., & Smith, D. J. (2012). The impact of nobel prize winners in economics: Mainline vs. mainstream.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71(5), 1219–1249.
- Böhm-Bawerk, E. (1881). *Rechte und Verhältnisse vom Standpunkte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Güterlehre*. Innsbruck: Wagner. Translated in 1962 as: *Whether legal rights and relationships are economic goods*. Libertarian Press.
- Böhm-Bawerk, E. (1892). Unsere Aufgaben.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1), 1–10.
- Brentano, L. (1871-72). *Die Arbeitergilden der Gegenwart*, 2 vols. Duncker & Humblot.
- Chaloupek, G. (2003). Carl Menger's contributions to the Austrian currency reform debate (1892) and his theory of money.
<http://www.chaloupek.eu/explorer/Mengeroncurrencyreform.doc>
- Clavin, P. (2015). *Securing the world economy: The reinven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20–194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en, D. R. (2007). *Vienna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Science, liberalism, and private lif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hen, G. B. (2007).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the dynamics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67–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0(2), 241–278.
- Craver, E. (1986). The emigration of the Austri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 1–32.
- Dekker, E. (2016). *The Viennese students of civilization: The meaning and context of Austrian economics reconsider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kker, E., & Kolev, S. (2016).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theories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 policy”. *Econ Journal Watch*, 13(3), 467–472.
- Derman, J. (2012). *Max Weber in politics and social thought: From charisma to canon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gger, H. C. (2001). *Die “Gesellschaft österreichischer Volkswirte” im Spiegel ihrer Publikationen*. Grin.
- Ely, R. T. (1936). The founding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6(1), 141–150.
- Franz, G. (1955). *Liberalismus: Die deutschliberale Bewegung in der habsburgischen Monarchie*. G. D. W. Callwey.
- Frie, E. (2013).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Kathedersozialisten und die Wirtschaftspolitik im Bismarckreich.” In U. v. Hehl & M. Epkenhans (eds.), *Otto von Bismarck und die Wirtschaft* (pp. 43–57). Brill.
- Glaeser, J. (2014). *Der Werturteil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Max Weber, Werner Sombart und die Ideale der Sozialpolitik*. Metropolis.
- Grimmer-Solem, E. (2003). *The rise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and social reform in Germany 1864–18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 A. (1927). Einleitung. In H. H. Gossen (ed.),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ß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pp. ix–xxiii). R. L. Prager.
- Held, A. (1869). Die ländlichen Darlehenskassenvereine in der Rheinprovinz und ihre Beziehungen zur Arbeiterfrag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3(1), 1–84.
- Hennings, K. (1997).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Eugen von Böhm-Bawerk*. E. Elgar.
- Hermann, F. B. W. (1832). *Staatswirth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A. Weber.
- Hildebrand, B. (1848). *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J. Rütten.
- Hollander, S. (1982). On the substantive identity of the Ricardian and neo-classical conceptions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French connection in British classicism.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que*, 15(4), 586–612.

- Horn, K., & Kolev, S. (2020). Dispute on method or dispute on institutional context? Foreword to the translation of Carl Menger's 'Errors of Historicism'. *Econ Journal Watch*, 17(2), 442–507.
- Horwitz, S. (1994). Subjectivism. In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pp. 17–23). E. Elgar.
- Hufeland, G. (1815). *Neue Grundlegung der Staatswirtschaftskunst, durch Prüfung und Berichtigung ihrer Hauptbegriffe von Gut, Werth, Preis, Geld und Volksvermögen, mit ununterbrochener Rücksicht auf die bisherigen Systeme*. B. Ph. Bauer.
- Jaffé, W. (1976).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Economic Inquiry*, 14(4), 511–524.
- Judson, P. M. (1996).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Liberal politics, social exper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Austrian Empire 1848–1914*.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auder, E. (1953a). Genesis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From Aristotle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Journal*, 63(251), 638–650.
- Kauder, E. (1953b). The retarded acceptance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7(4), 564–575.
- Klausinger, H. (2019). The National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 from its foundation to the postwar period: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Empirica: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s*, 46(3), 487–503.
- Klooster, J. (2022). Marginalism and scope in the early Methodenstrei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orthcoming.
- Kogan, A. G. (1949). The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ities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1(3), 204–217.
- Komorzynski, J. (1889). *Der Werth in der isolirten Wirthschaft*. Manz.
- Kolev, S. (2018). Early economic sociology and contextual economics: The Weber-Wieser connection. *Journal of Contextual Economics – Schmollers Jahrbuch*, 138(1), 1–30.
- Kolev, S. (2021). Ein Baltendeutscher bei den Preußen des Balkans: Oskar Anderson und das Sofioter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SWIFO). HWWI Research Paper 198, Hambur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Leipold, K. (2021). *Wissenswerte Erfahrung: Rekonstruktion von Erfahrung in der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Wissens (1871–1919)*. Baden-Baden: Nomos.
- Lenel, L. (2018). Mapping the future. Business forecasting and the dynamics of capitalism in the inter-war period. *Economic History Yearbook*, 59(2), 377–413.
- Mataja, V. (1884). *Der Unternehmergewinn,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Gütervertheilung in der Volkswirtschaft*. A. Hölder.
- McAdam, M., Kolev, S., & Dekker, E. (2018). Methods for understanding economic change: Socio-economics and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 1896–1938. *Journal of Contextual Economics – Schmollers Jahrbuch*, 138(3–4), 185–198.
- Meinecke, F. (1936).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R. Oldenbourg.
- Menger, C. (1871).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W. Braumüller.
Translated in 1981 as: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enger, C. (1883).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 Duncker & Humblot. Translated in 1985 a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enger, C. ([1891] 2016). The social theories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 policy. *Econ Journal Watch*, 13(3), 467–489.
- Menger, C. (1892). Geld.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pp. 730–757). G. Fischer.
- Menger, C. (1909). Neue Strömungen in der deutschen Sozialökonomie. Neue Freie Presse, October 23.
- Menger, C. (1923).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2nd edition. Hölder-Pichler-Tempsky.
- Nasse, E. (1861). *Bemerkungen über das preußische Steuersystem*. A. Marcus.
- Perrin, J. W. (1910).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2(659), 464–472.
- Philippovich, E. (1885). *Die Bank von England im Dienste der Finanzverwaltung des Staates*. Toeplitz & Deuticke.

- Priddat, B. P. (1998). Theory of subjective value in German nation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5(10), 1509–1519.
- Rau, K. H. (1826).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C. F. Winter.
- Roscher, W. (1874).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k in Deutschland*. R. Oldenbourg.
- Sax, E. (1887). *Grundlegung der theoretischen Staatswirtschaft*. A. Hölder.
- Salazar, F. (2021). The early reception of Carl Menger's *Grundsätze*: A review and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xtual Economics – Schmollers Jahrbuch*, forthcoming.
- Schmoller, G. ([1883] 2021). On the methodology of state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ntextual Economics – Schmollers Jahrbuch*, forthcoming.
- Schmoller, G. ([1897] 2018). Changing theories and fixed truths in the field of state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contemporary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Contextual Economics – Schmollers Jahrbuch*, 138(3–4), 213–232.
- Schüller, R. (1895).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ihre Gegner: Zur Geschichte der Socialpolitik seit A. Smith*. C. Heymanns.
- Schumacher, R., & Scheall, S. (2020). Karl Menger's unfinished biography of his father: New insights into Carl Menger's life through 1889.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38B, 155–189.
- Sheehan, J. J. (1966). *The career of Lujo Brentano: A study of liberalism and social reform in Imperial German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ith, A.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 Strahan and T. Cadell.
- Sommer, L. (1932). Das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hänomen des ‚Methodenstreits‘. Analogien und Präzedentien. In M. Adler et al. (eds.), *Festschrift für Carl Grünberg zum 70. Geburtstag* (pp. 487–537). C. L. Hirschfeld.
- Streissler, E. W. (1990).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economics on the work of Menger and Marshall. In B. J.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pp. 31–68).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reissler, E. W., & Milford, K. (1993).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ositions of German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1(3), 43–79.
- Streissler, E. W., & Streissler, M. (1994). *Carl Menger's lectures to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a*. E. Elgar.
- Tomo, S. (1994). *Eugen von Böhm-Bawerk: Ein großer österreichischer Nationalökonom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Metropolis.
- Tribe, K. (1995). *Strategies of economic order: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ed.) (1895). *Verhandlungen der am 28. und 29. September 1894 in Wien abgehaltenen Generalversammlung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über die Kartelle und über das ländliche Erbrecht*. Duncker & Humblot.
-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ed.) (1910). *Verhandlungen der Generalversammlung in Wien am 27., 28. und 29. September 1909: I. Zum Gedächtnis an Georg Hanssen II. Die wirtschaftlichen Unternehmungen der Gemeinden III. Die Produktivität der Volkswirtschaft*. Duncker & Humblot.
- Wasserman, J. (2019). *The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 ([1892] 1984). *Die Lage der Landarbeiter im Ostelbischen Deutschland. 1892.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3*, edited by M. Riesebrodt. Mohr Siebeck.
- Wegner, G. (2020). Reassessing the dependence of capitalism on democracy – the case of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6(3), 337–354.
- Wieser, F. (1889). *Der natürliche Werth*. Vienna: A. Hölder. Translated in 1893 as: *Natural value*. Macmillan.
- Wieser, F. (1910). *Recht und Macht: Sechs Vorträge*. Duncker & Humblot.
- Wieser, F. (1914).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Tübingen: J.C.B. Mohr (P. Siebeck). Translated in 1927 as: *Social economics*. Adelphi.
- Yagi, K. (1997). Carl Menger and the historicism in economics. In P. Koslowski (ed.),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th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newer historical school* (pp. 231–258).